

三十年来的南京方言研究

刘 顺

(南京审计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三十年来南京方言研究中,语音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入声、轻声、儿化和变调上,语音的基本面貌已经描写出来;词汇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出版了高质量的南京方言词典;语法的研究也已经起步,在动词重叠、特殊句法格式和个别助词的研究上有了可喜的进展。总体上看,南京方言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还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入,今后应该进行系统化的研究。

关键词:南京方言;语音;词汇;语法

中图分类号:H1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1)01-0092-06 **收稿日期:**2010-10-12

作者简介:刘顺(1963—),男,山东微山人,南京审计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学与汉语方言学。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09SJB740010);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08YYD012)。

一、引言

南京方言是江淮方言区的核心方言之一,其语音、词汇、语法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江淮方言的主要特征。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南京方言同时受到了华北方言和吴方言的影响,加上外来人口的增加,目前它仍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上个世纪2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发表了《南京音系》^[1],深入细致地讨论了南京方言的音系系统。20世纪50年代,全国各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方言普查,南京方言音系的调查成果发表在《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2]一书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地方志编撰的需要,南京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都得到了系统描写,主要成果有南京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的《南京方言志》^[3]、刘丹青主编的《南京方言词典》^[4]和《南京话音档》^[5]、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江苏省志·方言志》^[6]。其后,陆续有学者不断对南京方言进行研究,2000年以后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讨论的问题涉及语音、词汇、语法及其发展演变等各个方面。本文拟对三十年来南京方言研究进行述评,并就未来的研究提出看法。

二、语音、词汇研究

方言的重大差别体现在语音上,语音研究往往也会成为方言研究的中心和重心。近三十年来的南京方言研究也不例外。从研究方法看,南京方言的语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语音学视角下的研究,一类是实验语音学及西方语音学视角下的研究。前者的代表性成果有《南京方言志》、刘丹青的《〈南京方言词典〉引论》、孙华先的《南京方言声调的若干问题》^[7]和《南京方言的轻声和入声》^[8]、柏莹的《轻声性质探赜——以南京方言轻声为例》^[9]和《轻声音高模式的特性——以南京方言轻声和入声音变为例》^[10]、黄进《南京方言儿化合音的演化与语法意义的磨损》^[11]等。后者的代表性成果有马秋武的《南京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的优选论分析》^[12]、宋益丹的《南京方言中的入声喉塞尾实验研究》^[13]等。

南京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的《南京方言志》是一部全面描写南京方言系统的专著,它比较详细地描写了南京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词汇和语法特点。从语音的描写来看,作者根据南京方言的内部差异,将其语音分为新派和老派:新派比较接

近普通话,不分尖团音,有[an]和[ɑŋ]之分;老派集中在以中华门为中心的城南地区,主要特点是分尖团音,没有[an]和[ɑŋ]之分。该书以老派南京方言为对象,详细描写了南京方言的21个声母、42个韵母和5个声调,列出了声韵配合表和同音字表,对轻声、儿化和连续变调等语音现象进行了描写,并对新派和老派方音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这本方言志是目前能见的对南京方言语音描写最为全面、详细的一部著作,它勾勒出南京方言语音的基本面貌,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3]232}。其后,刘丹青在《〈南京方言词典〉引论》中也讨论了南京方言的语音系统。该文也是以城南语音作为南京方言语音的标准,按年龄差异分为四派:一为最老派,是城南八十岁以上老者的方言,现在使用人数很少,但被公认为老南京话的代表。其内部差别不大,发音用词也较稳定,语音特点跟赵元任的《南京音系》所说大体一致。二为老派,是五十五岁到八十岁之间的城南方言,其内部差别较大,同一个人的发音和用词也不稳定,时新时旧。三为新派,是二十五岁到五十五岁之间城南人的方言,跟上述两派差别较大,其内部差别也很大,城北多数中老年人也接近这一派。四为最新派,是二十五岁以下城南人的方言,其内部差别不大,城北中年以下及改说南京话的外来居民也接近这一派,中小學生基本通行这种口音。有时前两派用“老南京话”总括,后两派用“新南京话”总括。作者认为南京话有21个声母,49个韵母和5个声调,在韵母的数量上与《南京方言志》的描写有所不同。而且作者还具体描写了新老南京语音的不同,对南京方言的一些音变现象也进行了阐释^{[4]81-102}。从总体上看,《〈南京方言词典〉引论》中描写的南京方言语音系统更符合南京方言语音的现状。

南京方言有五个调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学者们对阴平、阳平、去声和入声调形看法基本一致,即阴平为降调,阳平为升调,去声为平调,入声为促调;上声的调形,究竟是曲折调还是平调,人们没有取得共识。在单字调的调值上,学者们也存在着分歧,主要是阳平的调值是13还是24,上声的调值究竟是212、22还是11,大家各执一端。

南京方言是北方方言区中极少数具有入声调类的方言,对南京方言入声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关

注的重点。孙华先认为南京方言的入声特色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一是高。在南京话的五个调类中,入声的调值最高,这一点是南京话入声自成一调类的区别性特征。二是短。南京话入声较短,但也不是非此不可。三是入声字的喉塞韵尾[ʔ]。现在喉塞韵尾趋无的倾向更加明显。四是紧。南京话入声字的元音是紧元音,单念时喉头肌肉和口腔肌肉紧张。目前,尽管南京话稳定存在着入声这一调类,但其成员趋于减少,说明南京话正在逐步向普通话靠拢^{[7]39}。孙华先的研究基本上揭示了南京方言入声的特色及其演变趋势,但其研究方法是在传统语音学背景下口说耳辨的,其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精确化和科学化。宋益丹在实验语音学背景下对南京方言入声的声学特征及其演变轨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她以苏州方言的入声喉塞尾为参照研究南京方言入声喉塞音的声学特征,发现南京方言的大量入声音节喉塞尾已经脱落,其中双音节更普遍。喉塞尾的脱落表现出相当大的随机性,是因词而异、因人而异、因语境而异的,没有明显的规律。这说明南京方言的入声处于动态变化中,喉塞尾已经全面弱化,整体正在向着喉塞尾消失的方向发展。将南京方言置于汉语方言的大背景下,可以看出,南京方言整体上正处于由“喉塞尾逐步弱化,音节时长逐渐变长”的阶段向“喉塞尾完全脱落,时长上的舒促对立消失,但还保留入声调类,入声调值不变”的阶段转变的过渡期^{[13]171}。该文的研究精确地刻画了南京方言入声的声学特征及其演变轨迹,为进一步认识这一语音现象提供了科学的数据。

轻声和儿化也是近十年来南京方言语音研究的热点。孙华先认为,南京话的轻声在韵律特征方面,有音强较弱、音长较短、音高取决于其所依附字的声调这三个方面的表现。他特别讨论了“阳平+轻声”中“轻声”的调值。“轻声化”的具体表现就是“读如入声”。正因如此,“阳平+轻声”组合中的轻声字可能会与“入声+轻声”组合中轻声字出现音位交叉的现象^{[8]67}。柏莹通过实验数据分析后提出了与孙华先类似的观点。她认为南京方言轻声的音高变化,使用与一般连读变调不同的另一套连读调式,一般连读变调采用后字不变的“右字调”型调式,轻声连读调式采用后字皆变的右向延展式。她还描写了南京方言轻声

出现的位置,即主要出现在某些后附性位置,如后缀、后附性虚词、重叠式的后字、一些常用双音节复合词的后字等。轻声的作用在于辨义、构词或构形、表明语法性质、表达色彩意义^{[9]157-159}。柏莹的文章是近年来讨论南京方言轻声问题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黄进对南京方言儿化现象进行了详细地讨论。她通过对城南和城北、老派和新派儿化音的实际调查,详细描写了南京方言儿化的语音事实,剖析了儿化音发音机理,分析了儿化音的演变过程,并指出了南京方言儿化音的语法功能。同时,她还就老派城南方言儿化与老派城北方言儿化的异同以及与新派南京方言儿化的区别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描绘出南京方言儿化的不同分布和基本面貌^{[11]22-23}。

马秋武在优选论的理论框架内对南京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进行了分析,指出南京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是以调型为主轴的,新老南京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的不同主要在于调域层面。在调域层面,新老南京方言的相同之处在于均不允许表层出现高调域的低平调;其不同之处在于不允许出现低调域的标记性制约条件与保持原有调域的忠实性制约条件发生交互作用,形成了不同的类型变化^{[12]32}。该文在南京方言语音变调研究上更具有理论性。

南京方言语音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普通话影响下南京方音语音的变化情况。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鲍明炜的《六十年来南京方音向普通话靠拢情况考察》。作者考察了自1928年赵元任《南京音系》以来南京话向普通话的靠拢情况,主要有[n]、[l]的分混,尖团音的分混,[a]、[ai]两韵的开齐问题,撮口韵的有无,e韵的读法,鼻音韵尾的读法等问题。与20年代的南京话相比,操南京方言的青少年有些能够区分[n]、[l],已经不再分尖团音,[a]、[ai]两韵的开齐情况基本上与普通话相同,有撮口韵的人大大超过无撮口韵的人。在作者调查的41个发音人中,有一半的人能够区分[an]和[an̚],已经有少数青少年开始能够区别[ən]和[ən̚]、[in]和[in̚]。文章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南京话首先向苏北皖北靠拢,建国以后向普通话靠拢,其前进的速度建国后比建国前快^[14]。卢偃从推广普通话的角度讨论了南京语音向普通话语音过渡的理论依据及阶段特征,她将南京语音向普通话语音过渡分为初级、中

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在初级阶段,声、韵、调系统脱离南京方言轨道,但仍保留一定方言痕迹,重点加强声调训练,突出主要的区别性特征音素;在中级阶段,方音的明显痕迹消失,但音感尚不到位,应有针对性地解决非系列性错误;在高级阶段,普通话高度流利,规范而富有美感,要重视高冷僻音节、冷僻声调及多音音节的训练^[15]。该文对南京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具有很高的指导作用。

南京方言词汇研究的主要成果体现在《南京方言词典》、《南京方言志》和《江苏省志·方言志》中。《南京方言词典》是研究南京方言词汇最全面的著作。该著作共440页,35.9万字,按南京方言的韵母、声母、声调为序排列,对南京方言词汇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作者在《南京方言词典》的引论中揭示了南京方言词汇的重要特点是同义词丰富,南北色彩兼备:同一个意思常有好几个词可选用,其中有带方言色彩的词,也有来自普通话的词;日常生活常用的亲属称谓中,南京方言的词也兼有北方特色和南方特色。在构词方式方面,最老派儿化词丰富,像北方话;老派以下“子”尾词用得最多,像江淮官话;此外也有不少“头”词尾和重叠名词,又接近吴语特点。这些词汇上的特点是跟南京的地理位置和人员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16]。《南京方言志》和《江苏省志·方言志》则根据志书的编辑特点,分类列举了南京方言特有的方言词汇,大致上能够反映出南京方言词汇的基本面貌。

三、南京方言语法的研究

与语音、词汇研究相比,南京方言语法的研究相对薄弱,除了《南京方言志》、《南京方言词典》和《江苏省志·方言志》等专著对南京方言语法概貌性的描述之外,单篇研究南京方言语法的文章还不多。我们检索了中国期刊网1980年以来的文章,发现研究南京方言语法的文章共有6篇,它们讨论的重点集中在南京方言特殊语法的语法现象,主要有动补结构、疑问句表达形式和特殊虚词三个方面。

刘顺、潘文通过南京方言的“VVR”动补结构和普通话“VR”动补结构的比较,对南京方言“VVR”动补结构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特点进行了深入细致研究,发现南京方言中“VVR”动补结构中“V”是单音节述人可控动词,“VV”的语法意义

表示动作量的增大,充分体现了数量相似性原则;“R”主要是表示积极的结果的形容词,它只指向“V”的受事,而不指向“V”的施事和“V”本身。“VVR”结构所在的句子只能表示未完成事件,没有否定形式,“V”的宾语采用主谓谓语句或把字句的形式放在“VVR”之前。作者认为,句类上它们都是祈使句,并且认为南京方言“VVR”动补结构形式可能是受吴方言的影响而产生的^[17]。刘春卉从南京人学习普通话的角度讨论了南京方言中的“V不起来”结构。“V不起来”作为动补结构,是南京否定可能式的表达形式,例如“卖不起来”的意思是“不能卖”或“卖不成”。作者认为普通话和南京话中都有“V不起来”的表达形式,但南京话“V不起来”仅有少数与普通话的“V不起来”表示相同的语法意义,大部分与普通话不同,其使用范围大大超过普通话。从表达形式上看,南京话特有的“V不起来”没有相应的肯定形式,其语法意义是“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V”所表示的动作不能做或做不成”^[18]。该文初步考察了这种格式的句法形式和句法意义,但对于“V”的条件以及它所出现的句式没有进行研究,对这种格式产生的原因也没有论及。

刘春卉还在同一篇文章中讨论到南京方言的疑问格式“阿/还 VP”和普通话疑问句的转换形式,文章认为“阿/还 VP”问句在普通话中有两种对应形式,即“VP吗?”句式和“VP不 VP?”句式^[18]。文章没有对这种疑问形式的句法、语义、语用以及来源进行讨论。吕文蓓研究了南京方言的选择问句,将南京方言的选择问句分为列项选择问句和反复问句两种形式。列项选择问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采用“是……还是……”的形式,一种采用“A的B的”的形式。第一种形式与普通话相同,第二种形式是普通话第一种形式省略了“是”和“还是”。例如“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句话,南京话是“你说的真的假的?”的说法。该文认为,列项选择问不是南京方言疑问句特有的形式,而是普通话渗透南京话的结果。吕文将反复问句分为四种形式:“VP不 VP”式,“阿/还 VP”式,小句+“是不是(行不行、好不好)”,“阿 VP不 VP”式。作者还讨论了南京方言的疑问词“呢”和“啊”以及各种形式疑问句的疑问程度^[19]。张薇也讨论了南京方言的反复问句。她认为南京方言中的反复问句主要有“VP不

VP”、“阿 VP”和“阿 V不 VP”三种类型,分类数量上少于吕文,但其描写的语言事实与吕文基本相同。作者对三种不同类型的疑问形式的来源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三种形式并不属于同一个历史层次,指出“阿 VP”句型的确是江淮方言乃至北部吴语固有的句型,但其产生的时间却迟于“VP不 VP”句型由北方传入的时间,这两种反复问句的形式之间也许并没有太多的关联^[20]。至于“阿 VP”产生的时间和产生的动因上述作者均未作研究,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姚伟嘉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南京方言中的“VP不 VP”句式“还/阿 VP+啊(啦/嗒)”的使用情况,发现南京人使用的“VP不 VP”式越来越少,“还/阿 VP+啊(啦/嗒)”的用法在今天南京人的口语中最为常见,影响市民选用哪种反复问句式的首要原因是“目前居住地”。城北居民还有人使用“VP不 VP”句式,城南居民更多地使用“还/阿 VP+啊(啦/嗒)”句式,而且后一种句式在南京方言中使用频率较高^[21]。作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普通话影响的结果,其原因是什么,文章并没有讨论,这还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研究。

刘丹青曾提到,新南京话一般不用“着”而用“倒”表示持续(如“他拎倒一个包”),并且指出,“倒”可以表示持续的动作状态或持续的心理行为,不能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4]100}。常丹丹从“到”(刘丹青写作“倒”)构成的相关句式入手,揭示了其涵盖的语法意义,并对其使用条件、适用的语境等作初步地描写分析。作者认为南京方言的“到”有四种不同的用法,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到”:“到₁”相当于普通话的“着”,表持续和存续意义,紧接在动词、形容词后;“到₂”相当于普通话的“在”,用于地点和时间前;“到₃”相当于普通话的“了”,用于完成体;“到₄”相当于普通话的“到”,表示动作达到目的或有了结果^[22]。常文对“到”的分化进一步刻画了南京方言中“到”的语法意义,深化了我们对南京方言中“体”意义的认识,但是作者只研究了“到”,我们还无法看到南京方言中“体”的表达系统。

南京方言语法有自己完整的体系,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所触及的面是非常小的,而且研究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入。下一步我们应该在词法和句法方面加强研究。

词法研究应该分词类进行,研究的重点应该

放在南京方言特有的词法现象上,主要是特有的动词、副词、介词和助词现象上。动词是携带语法信息最多的词类之一,南京方言的动词也不例外。与普通话的动词比较而言,最有特点的是南京方言的动词重叠。单音节动词可以四次重叠,表示动作在持续过程中,后面用表示出现新情况的短语或小句,如“他走走走走不认得路了”。动词带了补语后还可以重叠,如“扫扫干净、听听清楚、摆摆正、煮煮烂”等。动词重叠加“的”,由表示动作转化为表示状态,含有悠闲、随意、轻松、漫不经心一类的意味,动词前有受事成分,但不能移到后面作宾语,例如“她在柜台里头生意不做,毛衣打打的,瓜子磕磕的!”和“大家都急死得了,你还在这块二郎腿跷跷的。”南京方言动词重叠的条件及其表示的语法意义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南京方言的一些副词及用法也很值得研究,如程度副词中的“蛮、透、死、精、将好、将将好、将将就就”,范围副词中的“笼统、一正、连到、一塌刮子、夯不郎当”,时间副词中“头、后头、马即、赶嘛、先头、先才、才将、将将、弄不弄、一弄、长临了”,情态副词中的“好、得、该派、特为、亏好、有许”,等等。南京方言中还有一些不同于普通话的介词及用法,如“告、带、给”等,这些介词的用法复杂。“告”表示的语法意义有多种,如“桌子告我一般高(桌子跟我一般高)”,“我非要告他争这口气(我非要同他争这口气)”,“我告你打听一件事(我向你打听一件事)”,“去告碗拿过来(去把碗拿过来)”等等。助词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而使用频率极高的词“给”。普通话中也有这个词,其词性分别是动词、介词和助词。南京话中的“给”既有与普通话一致的地方,也有明显的不同。比如普通话说“这个公园不让进”,南京话说成“这个公园不给进”。这种用法在近代汉语中也有用例,研究这种用法,能为阐释普通话使役式的来源提供重要佐证。助词中最有研究价值的还有一个“得”,如“这个苹果红透得了”。《南京方言词典》认为这个“得”是结构助词,从其句法位置和语法意义来看更像是时态助词,相当于普通话的“了₂”。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如果能证明它是时态助词,就可以为普通话“了₁”、“了₂”的分离提供方言证据。

句法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南京方言特有的句法现象上。如对南京方言的疑问句及其与普通话

疑问句的比较研究,目前尽管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在研究清楚具体疑问句式的基础上研究南京方言的疑问句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再如南京方言的否定可能式与普通话可能式的比较也应是一个研究重点。南京方言的否定可能式使用非常普遍,如“新买的收音机听不起来”,“他送我的钢笔写不起来”。普通话也有“V不起来”的说法,但受到很多限制,刘春卉谈及这个问题,却对没能对这类句式的句法、语义和语用作深入研究。南京方言的双宾语句式跟普通话也有很多不同。南京方言中表示给予义的双宾语句,如果两个宾语都比较简短,它们在动词后的位置可以互换,如“你给他一支笔”和“你给一支笔他”、“送他两张票”和“送两张票他”、“退小张十块钱”和“退十块钱小张”都可以说。若宾语比较长,则常在指物宾语后用“给”引出指人宾语,放在指物宾语之后,如“他给了一半家产给两个儿子”。这些用法都是普通话中所没有的,值得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四、结语

三十年来,南京方言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两部方言志书描写了南京方言的基本面貌,一部方言词典对南京方言词汇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二十余篇论文研究了南京方言特有的语音和语法现象。这些著作既有共时的语言描写,也有历时的演变研究,还有社会学的讨论;研究方法也由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方向发展。就语言三要素来看,语音、词汇研究相对较充分,语法的研究显得较为单薄。然而,尽管学者们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整体上看,南京方言研究还非常薄弱,也不成系统,这与南京方言作为江淮方言区核心方言的地位极不匹配。今后应该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开展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在共时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历时发展研究和与普通话的比较研究,以期对南京方言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加大南京方言演变的研究。自从鲍明炜先生考察了上个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南京方言语音向普通话的靠拢情况之后,三十年已经过去了,而这三十年是我国社会飞速发展的三十年,南京市的人口结构、行政区划等发生了重大变化,普通话、吴方言、外来语对南京方言的发展演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出现了老派

南京话和新派南京话,新老派南京话之间的差异及形成原因至今还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这些都是今后我们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赵元任. 南京音系[J]. 科学, 1929(9): 1005-1036.
- [2]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0.
- [3] 南京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南京方言志[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1993.
- [4] 刘丹青. 《南京方言词典》引论[J]. 方言, 1994(2): 81-102.
- [5] 刘丹青. 南京语音档[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 [6]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江苏省志·方言志[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7] 孙华先. 南京方言声调的若干问题[J].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03(1): 34-40.
- [8] 孙华先. 南京方言的轻声和入声[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2001(1): 19.
- [9] 柏莹. 轻声性质探赜——以南京方言轻声为例[J]. 学术交流, 2008(10): 157-160.
- [10] 柏莹. 轻声音高模式的特性——以南京方言轻声和入声音变为例[J]. 学术交流, 2007(11): 163-166.
- [11] 黄进. 南京方言儿化合音的演化与语法意义的磨损[J]. 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3(1): 22-23.
- [12] 马秋武. 南京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的优选论分析[J]. 语言研究, 2009(1): 27-32.
- [13] 宋益丹. 南京方言中的入声喉塞尾实验研究[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9(2): 166-172.
- [14] 鲍明炜. 六十年来南京方言向普通话靠拢情况考察[J]. 中国语文, 1980(4): 241-245.
- [15] 卢偃. 南京语音向普通话语音过渡的理论依据及阶段特征[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1): 76-82.
- [16] 刘丹青. 南京方言词典[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4: 3.
- [17] 刘顺, 潘文. 南京方言的 VVR 动补结构[J]. 方言, 2008(1): 47-51.
- [18] 刘春卉. 南京方言中的“V 不起来”与“阿/还 VP”——兼谈语法同中有异对学习普通话的影响[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3): 44-47.
- [19] 吕文蓓. 南京方言选择问研究[J]. 现代语文, 2009(4): 95-97.
- [20] 张薇. 南京方言中的反复问句[J]. 现代语文, 2009(11): 95-96.
- [21] 姚伟嘉. 南京方言反复问句使用情况调查[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1): 44-45.
- [22] 常丹丹. 南京方言中的“到”[J]. 现代语文, 2008(11): 92-94.

(责任编辑: 黄燕 许成安)

On the Study of Nanjing Dialect in the Past 30 Years

LIU Shun

Abstract: The study of Nanjing dialect in the past 30 years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The phonetic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the entering tone, the tone, and the tone on the children, and the basic features have been described; the achievement of the lexical study is the publication of high-quality dialect dictionary; grammar research has been started, with progress made in the study on reduplication, the special syntax formats and individual particle. Despite the achievements made, the Nanjing dialect study is still incomplete and superficial, and the systematic studies should be conduct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Nanjing dialect; phonetics; lexis; grammar